

宁波地名谭

《琵琶记》和宁波有何渊源

徐雪英

象山是沿海的美丽县城，县城东郊有大徐镇，为著名革命诗人殷夫的故乡。大徐镇多山，也多古道，最有名的当属相思岭。

“十里的相思追不上你的马，最远的地方原来叫做天涯。我守着故土等落了多少花，弯曲的小径心碎又被记下。”这是半首现代相思歌词，却也写尽了象山民间传说中在大徐古道上相思心碎的赵五娘的心境。



瑞光楼故址风光



象山爵溪白沙湾赵五娘庙



上海昆剧团排演的《琵琶记》剧照



瑞光楼故址碑

赵五娘是元末戏曲家高明《琵琶记》中的女主角，是穷书生蔡伯喈的结发妻子。

有一年，蔡伯喈赴京赶考，结果十年杳无音信。他妻子赵五娘独自守着故土，服侍公婆，支撑家庭。那年灾荒，公婆双亡，她不得不剪发换草席，扒土葬公婆。因无依无靠又思念丈夫，就找人画了公婆画像，挟上雨伞，背上琵琶，黑衣白裙靠卖唱千里寻夫。最后，赵五娘终于找到已成宰相赘婿的丈夫，一夫一妻，团圆收场。

在象山当地传说中，赵五娘卖唱寻夫时曾途经大徐镇，在山岭上因伤心伫立良久，留下两个脚印，故名相思岭。

除大徐镇相思岭外，象山丹城附近还有赵五娘岭，也以赵五娘寻夫至此岭而名。另外爵溪白沙湾有弥陀寺，寺里女菩萨黑衫白裙、蓬头散发，当地村民说供奉的是赵五娘。

赵五娘本是高明作品中虚构的人物，却能留在宁波象山地名中，可见高明版《琵琶记》在宁波影响之大。除《琵琶记》本身魅力外，还可能与作者晚年客居宁波有关。

高明，字则诚，号梨园道人，浙江瑞安人。曾任元代处州录事、江浙行省丞相掾、福建行省都事等职。元至正十七年（1357年），高明赴任福建，途经庆元（宁波）时，被当时坐镇宁波的浙东农民起义军领袖方国珍留置，方国珍以“庆元路推官”授高明，想招高明投其麾下。高明力辞不从，却又脱身不得，只能客居于宁波栎社沈氏楼暂作打算。

栎社，现为宁波国际机场所在地，在古代也是水陆交通要冲之地，因奉化江及大小内河在此盘旋而过，所以栎社自古就是宁波通往台州、温州的重要驿站及要塞，史称栎社铺（铺：驿站）。方国珍坐镇宁波时，驻兵于栎社，因此高明当时也选择栎社沈氏楼寓居。

沈氏楼位于现栎社星光村中街，是明朝诗人沈明臣先祖的房子，俗称八间头。文献记载，沈氏从南宋绍兴年间迁居于栎社，以诗书传家，到元末已成栎社当地望族。沈家人对博学多才的高明十分器重，把他安顿在风光秀丽的临河私宅中，让高明有了潜心创作《琵琶记》的良好环境。

从元至正十七年（1357年）被方国珍留置起，至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高明一直寓居沈氏楼。除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外，高明还创作词曲以自娱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改编创作了南戏《琵琶记》。

南戏又称戏文，是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兴起的汉族戏曲剧种，一般认为由温州艺人创立，北宋末至元末明初盛行于江浙一带。南戏不但是海盐腔、余姚腔、昆山腔、弋阳腔等后代声腔剧种的鼻祖，也是南方多种地方戏的“祖师爷”。

但到元代时，南戏仍只是底层平民的艺术，和《琵琶记》雏形《赵贞女蔡二郎》故事一样，在平民百姓间流行，未能登上当时主流文学的“大雅之堂”。高明在充分吸取民间南戏的基础上，改编创作了耳目一新的《琵琶记》。

《琵琶记》无论在文辞、格律还是主题、架构上，都深得民间戏曲精髓，把《赵贞女蔡二郎》从普通的民间通俗读本演变成典雅规范的戏曲剧本《琵琶记》，大大提升了南戏的文化品格和地位。后来南戏很快取代元杂剧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戏剧舞台形态，被誉为中国“南曲”。《琵琶记》也成为南戏登入中国主流舞台的标志之作。

因为雅俗共赏，《琵琶记》一直深受各个阶层人民的喜爱，传说连明太祖朱元璋也很喜欢，曾把《琵琶记》比作民间不可缺少的珍宝。在《琵琶记》故事人物中，百姓尤其喜爱勇敢、善良、忠贞、坚韧的赵五娘，在宁波建庙宇供奉并让她的名字成为地名便是例证之一。

据传高明创作《琵琶记》时十分刻苦，三年闭门谢客，日夜苦撰。传说成稿之夕，他踏足按拍，吟咏剧中曲牌时，忽见桌上双烛火焰相迎交辉，良久才分开。因为觉得灵异，高明连喊“瑞光！瑞光！”沈氏楼由此更名“瑞光楼”，并随《琵琶记》闻名遐迩。现瑞光楼原建筑已毁，尚存故址碑。

《琵琶记》写成后，高明疾病缠身，要求离开栎社回归故乡，途经宁海时病卒。家人最终扶其柩回瑞安，葬于故里柏树桥南岸，立墓碑“元高都事则诚墓”。郑闻先生考证认为，《琵琶记》剧本最后经由鄞县鄞山书院山长（院长，时称“山长”）丁若水抄写整理，流传后世。

可能因为《琵琶记》写得太真，荡气回肠，作者又久居栎社，所以《琵琶记》在宁波广受欢迎，甚至对百姓日常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。作为缘海县邑的象山，至今仍保留如此多的《琵琶记》地名传说，这应该就是宁波百姓献给客居宁波十余年的戏曲家高明及《琵琶记》最诚挚的敬意吧。

三年勿去考 考场出青草

老话新聊

桂晓燕

大家知道，由于疫情影响，2020年全国高考推迟至7月7日开始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跟考试有关的话题。宁波有一句老话：“三年勿去考，考场出青草。”这里说的考场，指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乡试考场。乡试是秀才考举人，要在各省的省城或京城举行，每三年举行一次。因时间在秋天，所以又称秋闱。您瞧，三年时间里没人进出，考场的石板缝里，肯定要长出青草来了。这句老话同时告诉我们，这些秀才压力山大，一旦落榜，就得复读三年！

秀才从童生考上来的。所谓童生，并不是儿童小朋友，而是大朋友甚至白发苍苍的老朋友。明清时期，凡是尚未考取秀才资格的读书人，统称为童生，大概是表示他们的资格还嫩着呢。老底子宁波人对于那些考试经常吃鸭蛋，考卷上“大红灯笼高高挂”的学生，会笑他是“考勿出的老童生”，这比现在称其为“学渣”，要有文化内涵多了。我们宁波市区鼓楼西侧，有一条小路叫做呼童街（旧名呼童巷）。不是老妈呼唤孩童回家吃饭，而是与童生考试有关。原来清朝时，鼓楼附近有校士馆，也就是童生考秀才的考场。考试前童生们必须在这条小路上集中，听候传唤后方能进入考场，因此小路得名呼童巷。

考上举人后，第二年春天就可以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。会试又称春闱，由礼部主持，考中者称为贡士，可以参加接下来的殿试。殿试由皇帝“亲策于廷”，是科举制度中最高级别的考试。与其他考试不同的是，它只排名次，没有人被淘汰。以明清时期为例，殿试后分为三甲（即三等），一甲三名依次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赐进士及第；二甲赐进士出身；三甲赐同进士出身。据悉殿试是武则天首创的。为防止作弊，武则天还发明了“糊名”制，即用纸糊住试卷上考生的姓名。这一糊名（或匿名）办法，一直沿用至今的各类考试。

我国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，大致上经历了从世袭制、察举制到科举制的演变过程。夏商周三朝实行的是世袭制，官职按照血缘关系世代传承。只有出身豪门世族才能当官，寒门子弟难以出头。这种制度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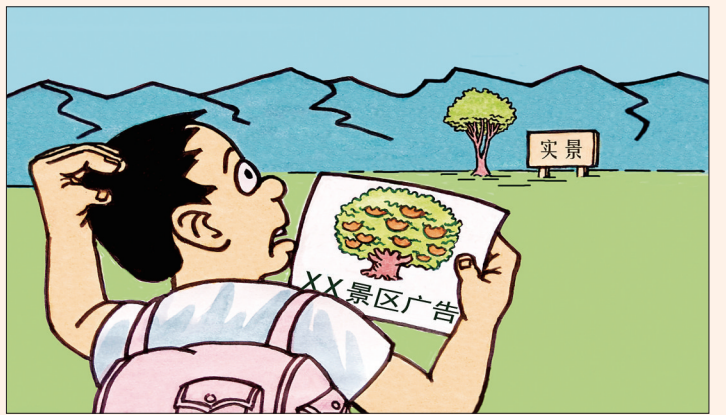
落后最不合理了。西汉开始出现了察举制，主要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进行考察，选取人才并向上推荐，那就要看地方长官的眼光了。至于我国的科举制创立于哪个朝代，史学界有不同看法，大致上认为起源于隋朝。打破世袭门阀垄断，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，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相对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。

人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，而科举制度在世界许多学者眼里，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。如果说四大发明体现了中国人在科技方面的聪明才智，那么科举制度则展示了中国人非凡的政治智慧。伏尔泰、孟德斯鸠、狄德罗、卢梭等思想家，无不为中国科举制所体现出的平等、公平原则所折服。科举制诞生后的初期，显示出生机勃勃的进步性，尤其是唐宋两朝，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才，如群星满天，熠熠生辉。到了明清时期，由于统治者推行八股文等种种原因，科举制度逐渐僵化，显现出诸多弊端，被世人诟病。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，但是科举首创的以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在全世界得以发扬光大。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，就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借鉴和发展。在我国国内，被称为“现代科举”的高考，尽管存在一定问题并受到各种批评，但是人们迄今找不到比它更合理的替代制度。

高考也好，公务员考试也好，其他任何考试也罢，一切考试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公平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在事关莘莘学子人生前途的高考中，竟会出现敢于践踏公平、窃取他人入学资格的怪事。其中甚至有班主任亲自出马，串通各路关键人物，上下其手，打通所有环节，让自己的宝贝女儿，上演了一出冒名“中举”的好戏。据报道，三起发生在山东的冒名顶替入学案的共61名相关人员，日前已被依法依规依法处理。与此同时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多位委员建议，将性质恶劣、社会危害性很大的“冒名顶替入学”行为入刑，以立法保障公民“前途的安全”。

教育公平是社会良心的底线，也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。希望孔孟故里永远不要出现这种有辱斯文之事，更希望全国所有的考试风清气正，真正为祖国选拔出有德有才之士。

漫画角



眼见为实

丁安绘



谁知

赵玉宝绘



过关

王怀申绘

“带货经济”不是“网红经济”

新知

赵磊

今年，在媒体的牵线搭桥下，直播带货中出现了很多市长、县长的面孔。同时，以拼多多为代表，电商平台掀起了“战疫助农”“消费扶贫”新模式。领导带货有助于当地农户搭上数字经济快车，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。同时也推动了地方政府与电商平台、短视频平台之间深度合作，通过大数据分析指导销售思路，建立农产品以销定产模式，打通了上下游产业链，从根本上惠及广大农民。

例如，作为快手上最炙手可热的主播之一，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赤土乡贡色村的格绒卓姆已经拥有了近200万粉丝。收青稞、挖虫草、唱藏歌，她借助快手平台，宣传家乡的乡土人情，帮村子脱贫致富。2018年的虫草季，格绒卓姆利用快手平台，一个月帮助整个村卖了30多万元的虫草和松茸。她的故

事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，2020年1月还登上了美国《时代》周刊。

“带货经济”带活了乡愁。90后的李子柒爆红海外，在YouTube上的粉丝突破1000万，成为首个在该平台粉丝破千万的中文创作者。她的作品大量表现中国农村场景及古风古韵，深受海外网友喜爱。李子柒100多个视频就有超过1000万粉丝，超越了美国三大媒体粉丝数量，BBC粉丝862万，CNN粉丝948万，HBO粉丝201万。很多人反思李子柒为什么火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在短视频中高调为中国文化“带货”，却不急于卖货。

带货经济不应是带“祸”经济，要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界定。直播带货的进入门槛较低，背后存在诱导消费、虚假宣传、质量差、退货维权困难等诸多问题。还有的把带货搞成“视觉污染”，以低俗言语、画面博出位、求关注。如此种种，都让这一新兴行业充满了浮躁气。直播带货不该是质监盲区、法律盲区。

“带货经济”不是“网红经

济”。在中国，与网红经济相关的词汇还有“多渠道网络”（Multi-Channel Network，即MCN），MCN靠孵化网红为生。近日发布的《2020中国MCN行业发展研究报告》提到，2019年中国MCN机构数量一举突破20000+，相较于2018年翻了近4倍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网络红人意味着流量经济，看谁能够吸粉（丝），“流量就是第一生产力”。因此，隐私保护、知识产权保护、信息安全等问题还没有完全纳入法制化、规范化轨道。

笔者在海外调研时，常常问外国友人如何看待中国产品，很多人马上会说两个词，一个是便宜（cheap），一个是质量不好（poor quality），即“便宜没好货”。“带货经济”给很多人的感觉也往往是主播如同打鸡血式的“传销”，要么是千人一面的美，要么是作践自己的丑，就是为了吸引眼球，不断突破底线，这是不持久的，早晚会出现“审美疲劳”。未来，“带货经济”一定会从国内走向国际，会从眼球经济走向心灵经

济，始终不变且需珍视的应该是质量与信用。

在国内经常听到，“告别内容为王的时代，迎来IP（知识产权）为王的时代”。这种说法在国外是不成立的。外国专家认为两者是如影随形、相伴相生的，不能割裂。因此，对“带货经济”而言，货是硬核，真正的好货就是好内容、好IP。而在国内，的确很多人是把内容和IP分开来看的，所以导致短视频平台上“带货经济”发展很快、野蛮生长，但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、不诚信的行为时有发生。因此，要培育带货主播以及公众对数字经济的知识产权意识，要建立良好的“带货经济”生态与诚信机制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。

在“带货经济”时代，我们不应丧失对“货”的想象力，什么是“爆款”？除了快消品、日用品、土特产与乡愁之外，能否带知识、带观点、带视野？任何一个行业，最终成功的密码都是：尊重自己所选择的事业，并带动社会进步，由此赢得尊重。

来源：北京日报